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何謂“戰後日本”？

What is "Post-War" Japan?

doi:10.6752/JCS.200806/SP_(6).0009

文化研究, (6_S), 2008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_S), 2008

作者/Author： 陳光興;子安宣邦

頁數/Page： 112-130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08/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9](http://dx.doi.org/10.6752/JCS.200806/SP_(6).0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子安宣邦思想論壇

《文化研究》第六期（增刊）（2008年夏季）：112-130

何謂「戰後日本」？*

What is “Post-War” Japan?

時間：2008年4月9日

地點：交通大學人社二館326室

與談人：陳光興（*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執行主編）

口譯：橫路啓子（輔仁大學日文系講師）

騰稿：馮啓斌（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校對：林郁曄（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

陳光興：

大家可以看到子安先生到現在還不會累，我碰到好幾位日本那一代左派的前輩都是這樣，到了七十幾歲還在戰鬥。幾年前，子安先生到台灣開會，我們曾有過一次交流的機會，今天很高興再次見到子安先生。

我得先說明的是，我不懂日文，所以沒辦法完全地掌握子安先生思想的整體，尤其他很多作品沒有譯成中文，我沒辦法閱讀；但是同時要非常感謝子安先生的是，他提供一個契機，起碼對於坐在這裡的各位，讓我們有機會開始了解琉球（沖繩）¹，雖然沖繩就位在台灣的旁邊，可是大家對它都不了解。因此，我的回應不會放在子安教授所提的問題意識之內，而是藉此機會向大家報告我所認為沖繩問題的核心。

琉球問題很重要，原因是這個問題除非由日本內部來解決，否則就只能是個無解的問題，也就是說，要推動國家去轉變既有的政

1 編按：琉球群島於1429年統一成為琉球國，1609年日本薩摩藩入侵干預內政，至1879年日本兼併琉球國，改名沖繩縣。以下文字依照演講當時發言的用法，不另行統一處理。

治關係，不只是琉球的問題，也牽扯到美國。所以子安先生在這裡談及琉球，我並不感到意外，我倒覺得這提供我們一個契機，使得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鄰居，以及我們沒有注意到我們與琉球的密切關係。

我自己第一次去琉球大概是2000年，是被邀請去參加一個國際和平運動，由武藤一羊等老運動家所組織而成。武藤先生從60年代安保運動開始就積極投入，直到今日。2000年，他們利用G7高峰會議在沖繩召開的機會，籌組了一個國際的和平論壇來處理美軍基地問題，這也是一個長久以來都沒有解決的問題。

若是曾去過日本，你就會發現沖繩不是日本，事實上這是兩個不一樣的地方。當然沖繩原本的語言已被同化，基本上是使用日文，但整個感受是非常不同的，尤其是對外來者的我們而言。到了沖繩，有個大家都一定要吃的東西，就是苦瓜。另一個就是叫awamori（泡盛）的酒，這個酒的味道很重，不是清酒系列、也不是燒酒系列，它有自己的一套。對於我們這些外部的外部——作為日本的外部、作為琉球的外部——來講，沖繩和日本不是同一個地方，各有各的屬性，雖然表面上語言是相同的。

其實剛才子安先生已經開始進行對話了，他演講之前就已經看到我現在發言的提綱，特別是針對琉球的定位問題。基本上，我接下來的發言是企圖利用這個機會，告訴在座的朋友有關琉球為什麼與我們有關係，又為什麼應該要納入我們討論的視野，但事實上卻還沒有做到。

一、作為「東亞」的沖繩：台灣與沖繩的戰後（無）關係。首先，沖繩問題是日本問題，但不只是日本問題。在這個意義下，它是一種外部，至少它是一種加上引號的「東亞」的問題。當然，我知道子安先生對於「東亞細亞」這個概念有他的疑慮及顧忌，所有談這個問題的人都有。但為什麼說它是個區域性的問題呢？台灣跟沖繩的戰後關係到底是什麼呢？

2000年我到沖繩時，碰到琉球的朋友，他們一知道我是台灣人，

就帶著些張力地跟我說「台灣是個讓我們很害怕的地方」。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台灣有什麼好怕的呢？問題關鍵在於這是個區域問題，不是日本問題。試想，台海戰爭一旦發生，哪個地方第一個被摧毀？沖繩的美軍基地無疑是中共首先想要摧毀的地方，因為基地覆蓋的面積很廣，琉球會整個毀掉，在戰爭發生的關係點上，以當下的觀點視之，他們非常害怕台獨，或說台海戰爭。

這只是當代的狀況。在整個歷史發展過程裡，念過皇民文學或看過相關題材電影者即知，琉球和台灣相互的想像關係一直存在。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的時間較晚，所以覺得琉球比較像日本、比較接近日本本土、比較高檔。但反過來，在琉球的一些小說和文學裡可以看到，日據以後，琉球人認為台北更接近東京。

這種歷史關係一直存在、也一直在變化，到了戰後，台灣和琉球的文化關係大致上已被切斷，兩地之間沒有太多的交流。但現在已開始逐漸恢復交流，有一些飛機是直飛沖繩、再從沖繩飛上海，只是班次沒有很多。

從這個觀點來看，很清楚地，沖繩從來不是一個孤立的狀態，我們無法從日本本島跟沖繩之間的關係來想像，實際上是，一旦發生什麼事情，狀況馬上就會上升成為區域問題，甚至是世界大戰的問題。

二、沖繩從未「戰後」。第二部分是我的一些閱讀，特別是和子安先生今天的講題「戰後日本論」相關，我建議大家可以參考一篇很重要的文章：“Okinawa’s ‘postwar’: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military bases in the aftermath of terrestrial warfare”²，作者是鳥山淳(TORIYAMA Atsushi)。他討論了沖繩作為二次大戰的最後戰場，直到1972年返歸(reversion)前的整個過程。在沖繩講「戰後」，永遠都是指括號的「戰後」。所謂的「戰後」，在琉球直到今天都不曾發生，也就是戰爭從來沒有結束。

我不知道該怎麼描繪，若去過沖繩，這是不能不正視的部分。我們沒辦法重述那種慘烈的狀況，但這些直到現在都還活著——死人的幽靈。如同剛才子安先生所說，1/4的人口被殺，每一家都有死人。若到沖繩去，不要到旅遊區，而是去住宅區看，當地的房子在屋簷上面都有個像是獅子的造型圖案，是用來保護家戶安全的動物、圖騰、象徵。沖繩的歷史過程裡有太多人死亡，那是一個充滿死亡氣氛的地方。我們無法重回戰場來感受這些，你非得到那些地方，鑽到地下防空洞，才能體會人怎麼在裡面被屠殺等等。

這是無法閃躲的，直到今天，戰爭的陰影仍然存在。要怎麼去拔除這種狀態？有的是透過許多儀式或巫術等，跟死亡的幽靈重新溝通，很多的問題是用這些儀式來進行處理。在許多層次上，戰爭從來沒有結束，戰爭也隨時可能發生，雖然是在冷戰的格局底下，但琉球從來沒有離開過「熱戰」的可能性。假如軍事基地占了1/3以上的土地，那怎麼辦？

我非常建議大家可以讀這篇文章。鳥山淳在文章中運用了許多當地人、學生、老師等的記述與描繪，詳細記載了到底發生什麼事。在戰爭開打後，老師在山丘上看到整個島面像是下雪一樣，琉球怎麼可能會下雪？那是戰爭的炮火、全島被摧毀的慘景。他不僅僅在記錄這些東西，也談到1972年以前，反抗基地的運動是如何展開，原來都很乖順的琉球居民如何組織起來面對軍政府？關於這部分，最後我會回過頭來談。美國的軍事設施，在台灣、在我們這種反共的地方，被過度地美化，不只是沒看到琉球，同時也沒看到琉球的慘劇，直到現在。

我有部分的理解是透過一些朋友的介紹，雖然我不是很懂，但據我所知，如富山一郎等人的著作，在琉球蠻受重視。他所書寫的是當時的戰場和戰場的記憶。現在已有很多和沖繩相關的書籍和圖片產出，懂日文的人，我會建議可透過這些東西來認識沖繩。主要關鍵的問題是，到底沖繩「戰後」有沒有發生過？某個層次上來說，是「有」的，譬如立刻停止屠殺；但從另外一個角度出

發，戰爭也可說是從來沒有結束過，沖繩人的精神狀態大概是這樣的。

三、沖繩的「戰前」：歷史地位 / 定位——縣，殖民地，藩屬國，軍事占領地？

1372 琉球向明朝朝貢

1609 九州薩摩藩攻打琉球

1872 日本併吞琉球

1879 廢藩置縣

1945 美軍占領沖繩與日本本島

1952 日本脫離美國麥克阿瑟(McArthur)軍政府獨立

1972 沖繩「返歸」(reversion)日本

那麼到底要怎麼談沖繩問題？子安先生講得很清楚了，他是從戰後開始談。但我想請大家回到戰前，從戰前來審視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因為我覺得從戰後來談沖繩是談不清楚的，那是用一個切斷歷史的縱深，以現代民族國家的方式在談琉球，而沒有回歸到琉球的歷史真實狀態在談琉球。

1372年琉球向明朝朝貢；1609年是日本九州薩摩藩攻打琉球，琉球王被抓，從此以後琉球開始向日本朝貢；接下來是1872年被日本併吞；到1879年「置縣」，即把琉球從藩屬國變成內部的縣，這其實是1879年的事情，跟1895年台灣變成殖民地，時間上只有十幾年的差距。接下來重要的年代是1945年，美軍攻占沖繩跟日本本島，這是個關鍵年代，在台灣也很少人談這個問題，在日本則是揮之不去的陰影。

也就是說，1945年到1952年，從政治學理或實際狀態來看，日本似乎變成了美國軍政府的殖民地？還是託管？無論是哪一種情況，總之都是在美國軍政府的統治之下。麥克阿瑟元帥在沖繩問題上扮演了關鍵角色。直到1972年，返歸、回歸、reversion、返

回到日本的過程裡，這中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回到歷史來看，子安先生是把它當成一個內部殖民來看待，我站在一個外部的觀點，還不知道該如何看待才是。在學理上，沖繩沒有脫離殖民地，從現代的觀點來看，它到現在還是殖民地。沖繩不是後殖民。可是這樣講好像又不能全說通，所以我們再往前推，牽涉到「藩屬國」的問題。

在日本有一整套論述，比較代表性的人物是濱下武志教授。濱下提出「朝貢體系」，大概很多人知道。東亞自己原有的國際關係結構，是以朝貢環繞著中國為主的朝貢關係，以藩屬國圍繞著宗主國。什麼叫作朝貢？朝貢有如黑社會體制裡面的「地盤關係」，你拜我作大哥，我就照顧你這位小弟，甚至給你更多，這是黑道的道義關係。我對黑道沒有道德性的譴責。我們還可以用另一個方式來理解：現在流行用「天下」來形容，但是也可以用「江湖」來理解。江湖關係是各人有各人的地盤。琉球目前有130萬人，琉球的國防如何建立？當時有很多海盜，於是我拜你作老大、向你朝貢，我的海防關係或有海盜騷擾時，你要幫我解決。「朝貢體制」有這樣的照顧關係。

所以我是這樣來理解「朝貢體制」。朝貢體制跟現代民族國家有什麼關係？現代的民族國家有一個虛假的平等主義，國與國平起平坐，《安保條約》成立以後，我們兩國平等、互惠，我作為主體簽定協約，讓你的軍隊住在我家，這是現代民族國家的作法。其實現代民族國家跟朝貢體制有著幾乎一模一樣的流氓關係，就看誰的拳頭大。到最後，聯合國中誰錢拿最多，誰就講話，誰就最大。

現在很大的危機是在國與國關係底下談不清楚，而用一些虛假的平等關係，其實講白了就是有沒有尊嚴，面子有沒有不好看，抽象來說，就叫作「主權有沒有被剝奪」。用「residual sovereignty」來描繪戰後日本，指的就是存餘的、一點點的主權，但主權不是一個能講得很清楚的概念。在整套體制底下，我認為現代的東亞關係，直到今天仍是一個歷史關係和現代民族國

家想像的混合體。但是，戰後東亞民族國家的建立，除了琉球之外，都是朝貢體系時代的獨立王國，在此歷史的意義下，琉球是有獨立的基礎。

這個準確的歷史關係假如我們叫作「朝貢體制」的話，再加上現代民族國家，這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態？假如在這個條件下來描繪的話，為什麼沖繩是東亞問題？原因是它濃縮了整個東亞世界的問題，全部問題都在沖繩發生了。沖繩到底是不是軍事占領地？意即作為美國的軍事占領地，沖繩到底是不是藩屬國？到底是不是殖民地？到底是不是「縣」？這些說法大概都對，也都還不夠。這不是個單一的、可以描繪清楚的狀況。在這個條件底下，到底要如何確立沖繩的位置？它的可能性在哪裡？

四、被日本「交換」給美國的沖繩：「戰後」日本的定位——經濟大國，文化心情的「第三世界」，美國的藩屬國？在上述的討論基礎下，我們可以將問題持續擴展開來談，繼續追問「日本戰後問題」。在這部分的討論裡，我用一個標題叫作「被日本『交換』給美國的沖繩」，這又牽涉到日本戰後的定位問題，「日本戰後」到底是什麼？這是直到現在都沒有解決的問題。我也不可能解決，畢竟我不是日本專家，我只是感受到它糾纏在一些問題裡無法掙脫。剛才子安先生用了叫「分裂狀態」的概念來談——要不就是同化，或認同國家的講法跟作用，不然就是否定國家。

不管愛或恨，正面或反面投射，很清楚地，這個論述對象都是「國家」。雖然有很多其他論述在談這些問題，包括我剛才講的武藤一羊先生，他一直強調，在亞洲內部，第三世界的人民與人民之間越界的靈魂，也就是跳脫國家、跳脫state、跳脫government，所以他們提出一個戰略的路線，但實行上非常困難。舉例來講，談及國防關係與安全問題時，所謂安全問題，大概就是在談論國家的國防問題。但他們提出來另一條路線，叫「people to people security」，人民對人民的安全問題，而不是國防層次的問題。國家有它的位置，談國防的時候，人民的意願是進不去的。為什麼國防都是比較秘密的，只掌握在國防部和幾

個人的手裡，人民的意願、意志在過程中如何參與？還有一派人對國家徹底地失望，但並不表示就是無政府主義，他們知道國家會存在，可是要找到其他的路徑，所以他稱為「people to people relation」，人民與人民的關係。通常這是在社會運動的層次實踐，舉例來說，勞工越界結合起來對付其他的國家，事實上很多勞工運動正是這麼作的。

在移民問題日益嚴重的今日，這個問題大概就變得非常關鍵且複雜。例如台灣移民到德國去產生權益問題，政府基於政府的利益考量而不管，此時就得靠台灣的勞工團體去連結德國的勞工團體，提供協助、打官司等。但這中間又有些差異，譬如，有一些論點會認為NGO已經變成是國家的延伸機構及外圍組織，這又是另外一種說法了，在此不多說。不過，大致上會有這樣的一種路線，實踐到今日，已產生了一些象徵意義。到目前為止的真實狀況是這樣，到底有沒有作用，還要慢慢再觀察。它到底可以改變什麼，特別是現在流行的「全球化」，這好像變成是另一個必須要處理的問題。

回過頭來說，因為這樣的分裂，尤其到現在——這個會慢慢進入我企圖跟子安先生對話的部分——日本知識界到底怎麼自我定位？這是個很困難的問題，特別從現在的觀點來談。

這時候要把台灣和南韓的經驗拉出來，在台灣或南韓的民主運動起來之前，在整個東亞地區，大家看日本都是往上看：這地方比我們有前途，有民主，社會運動也蓬勃發展。可是子安先生點出問題的關鍵：《和平憲章》。用個粗暴的講法：「這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禮物」，亦即戰後美國，說強加也好，或者是「給」——我覺得「強加」不完全對，而是裡應外合、有個相互關係的存在而接受這套憲法。包括日本左派，在這個過程中的妥協，妥協就是接受。日本應該要變成非戰國家，對於亞洲人民抱有歉意，所以他認為這條路線是符合他的政治路線。可是這部憲法是美國軍政府給的，也就是殖民政府給的一套憲法，現在回過頭來怎麼看待？到底有沒有經過一個民主過程？假如有，軍政府拋出來、經

過日本社會嚴厲的檢驗和辯論，這就是另一回事。

所以爲什麼說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那是沒有經過鬥爭所取得的民主。我們其實也很看不起我們自己，可是最起碼當初跟國民黨鬥爭也鬥爭那麼久，才取得一些戰果。所以到底要如何回頭看待《和平憲章》的出現？我寫過這個論題，但很少人談。

日本戰後的經濟復甦非常快速，到1956、57年，10年內基本上已經完成，對於安保可以這樣來理解，但那是把日本關起來的一種理解方式，也就是說，我取得我的自主性和自信心了，包括像小泉純一郎說要派出自衛隊等，都是在展現這個國家的主體性。

關鍵就在這裡。我們再把視角拉開來，台灣、南韓在戰後1940、50年代時的國防預算比例多少？是50%以上，初階段甚至到60%。韓國也是。這用在冷戰體系裡對抗共產匪幫。比較一下日本、韓國及台灣，就知道經濟大國的興起跟沒有國防預算有很大的關係，包括後來的韓戰、越戰這些軍費不斷地進來，造成日本的經濟復甦。當然前提是，國防軍事交給美國。日本政府現在想要提出一些軍事預算，於是就產生了很多問題，例如：《安保條約》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平等條約，還是日本上面還有另外一個宗主國？日本到底是不是美國的藩屬國？我的意思是說，戰後直到現在，日本的外交關係、戰略關係裡，有一個永遠沒有辦法變動的主軸，就是跟著美國走。

這也牽扯到子安先生一直談的：什麼叫作「獨立」。1952年沖繩到底獨立了沒？沒有的話，要怎麼思考這些問題？

經濟大國又涉及到我使用的第二個詞——「文化心情的『第三世界』」。在實際的層次和操作上，日本知識界和歐美的關係不是平起平坐，在心情上跟我們比較接近，又有自卑感、又有自大狂，全部糾結在內心深處。這是客觀的真實狀況。我認爲日本可以處理它和亞洲的問題，只要它從天上降落到地面，跟我們一樣變成第三世界，不要再自認是經濟大國、第一世界，也不要再說「連美國人都住在我家，把軍隊放在我家」之類的話。

被日本交換給美國的沖繩，這個在前面引用的鳥山的文章裡講得很清楚，1952到1960年間，日本本土的軍事基地面積從30,000公頃，降到8,000公頃，同時沖繩的軍事基地從42,000公頃上升到75,000公頃。也就是說，日本本土的軍事基地幾乎全部移到沖繩。住在日本的人，如何能不管沖繩？他們正是透過這樣的置換關係，把自己的危機推到別人身上去。

隨著冷戰鬆動、鬆綁以後，討論問題的契機似乎開始出現。在日本內部，有良心、有批判性的知識分子把它當作是「自己的」問題來處理，我認為這牽涉到日本直到現在的定位問題——要不要重新定位？

很多人會用一種講法叫作「脫亞入歐」，我一直認為這樣子的講法不公平，因為台灣、南韓這些地方「脫亞入美」的程度遠遠大於日本，但是以日本為例，和美國的關係，要如何重新回到這個區域，不管怎麼劃分，如何回到這個區域內部來討論，我覺得這是關鍵問題。也就是說，原來10年要重新簽署一次《安保條約》，現在可不可以停止安保協定？我們當然不是政府領導人，可是有很多想像的可能方式，譬如停止安保協定的前提會是什麼？舉例來講，在區域內簽署和平協定，也就是沒有武力的問題，日本還是可以堅持非戰國家的原則，不一定要有安保協定。當然也可以說，我情願相信美國，也不相信北韓或中共，可是最起碼要有一些動力轉化既有的戰後關係。到目前為止，日本官方沒有這種動力。民間是另外一回事，民間有很多和平運動，包括我剛才提到有一些知識分子對沖繩的關心並將之帶到日本本土，都在企圖轉化政府僵硬的立場。

五、「沖繩問題」的解決。最後回到沖繩問題的「解決」，這裡的「解決」當然要打引號，也就是說，能解決嗎？或許我們可以在此進行一些想像。沖繩的獨派人士有種論述叫作「小國主義」，即一百多萬人作為一個小國家，實質的內容我不清楚，最起碼這裡有一個具主體性的想像——小國主義，沒有把自己當作泱泱大國，也就是說能看清楚自己的位置在哪裡。這是蠻務實的

講話，但這是不是獨立？值得商榷。獨立之後能作些什麼，這又是另外的問題。

回到朝貢體系來談，從朝貢體系的歷史來看，到了戰後幾乎所有朝貢體系內的藩屬國全部都獨立了。沿著這個周邊，朝鮮（雖然分成南北）、越南等這些地方都已經獨立了。無論你認為日本是否算是中國的藩屬，但最起碼沿著這個切線，日本也獨立了。只有琉球是例外。琉球是藩屬國，它原是獨立王國，後來被日本吞掉。從這個觀點來看，琉球是被日本吞掉的、是殖民地。

對於沖繩的定位有很多談法，現在還有很多另外的講法，比如不是獨立、而是叫作「自治」，獨立是一個按照老概念的想法，包括台獨也在想這個問題，即民族國家的問題。可是脫離民族國家的問題，到底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可能性？我剛才說，要回過頭來對照台灣獨派的問題，從理論上來講，台灣的獨派應該要跟沖繩的獨派結合，兩方都在尋求獨立的路線，但是對我們來說，琉球的重要性就在這裡，琉球的獨派絕對是反美的。

很顯然地，反美和反（美軍）基地的運動會持續下去。我認為在台灣語境裡要充分了解的是，對於帝國主義式的民主，特別是對於琉球1945年到1972年的軍政府統治的這段歷史，是在整個世界政治史上不應該被抹掉的一頁，琉球人在這個體制底下受到多麼慘烈的迫害，這部分我覺得要持續地去談。

子安教授昨天提到東亞細亞的話題，在整個話題裡牽扯到大東亞共榮圈的問題，這是很敏感的問題。我不是很常談東亞共榮圈的問題，我一直在想的問題是，放在世界的局譜裡，我稱之為Asia Union，就是「亞盟」，不管用共同體、亞盟、亞體或其他名詞，我認為這是要被想像的。也就是當我們牽扯到的一些問題的時候，比如牽扯到琉球問題、台海問題、南北韓問題等主權不確定的地方時，可以放在更大的框架裡來討論，但是並沒有脫離整體。我要強調的是，這是放在世界的光譜裡面來討論，特別是相對於美國這個龐然大物在區域裡產生的作用而言。

最後我認為，有一個關鍵、但到目前為止很難被談論的：日本跟它前殖民地之間的互動關係。我在想像些什麼呢？舉例來說，去(2007)年我們辦過一次沖繩的論壇，是在文化研究學會年會的隔天，那次年會去的人很多，約有八、九百人，但是，沖繩論壇只去了十幾個人，大家對這個問題不關心，也不感興趣。這裡面有個關鍵問題，我一直想從這些對話中找出有沒有一種可能性，是前殖民地的人互相見面，談自己怎麼看待自己的被殖民歷史，怎麼書寫，可是通常這些事情為什麼不會發生？

劉紀蕙：

謝謝光興。我想光興是覺得非講不可，我們也很高興聽到光興的一些論點。當然，子安先生他的反省是帝國視角的內部的自閉、自戀或者是內部的局限，以致於有計算的方式與無法計算的方式。這是一種biopolitics（生命政治），怎麼計算死者、建立國家的政體，進入到安保的對等關係，其實也進入到另外一種交換體系、另外一種的從屬關係，或者遊戲規則，以致於間接地也召喚了生者。

光興要指出的是，在亞洲，這個糾纏的歷史關連是不可以單獨或無法單獨來看的。不管是日本 / 台灣、日本 / 琉球或者是台灣 / 中國等等，這裡面牽涉到目前民族國家之間某種「rogue state」、即流氓國家之間的關係，說是從屬、藩屬、朝貢或者是對等國都是一樣的。他要比較靠近地去反省我們為什麼還持續在一個軍事預算這麼高，或者是軍事基地這麼多的狀態，我們有沒有脫離國和國的關係、進入到人民和人民之間的關係，有沒有可能用不是國家的關係去重新思考亞洲的問題，譬如他所說的前殖民地的知識圈的互動。這當然是光興持續的關懷。

現在我們請子安教授先回應，然後開放討論。

子安宣邦：

首先我要釐清我今天的主題是，若我們站在沖繩的立場思考戰後日本，是否可以得到新的觀點。而陳光興老師所講的是「沖繩

論」，他想解決沖繩問題，所以我們兩個的問題意識完全不同，我認為陳光興老師所談的內容不是對我的回應，所以我無法多作回應。

如果其他人有什麼問題的話，請盡量問我。

現場與會者：

我想請問，若沖繩是個觀點，那麼北方四島呢？北方四島目前被前蘇聯、現在的俄羅斯占領，若有朝一日得以歸還給日本，是否能成為另一個看待日本自主性的指標？這是我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北方四島的處理、解決辦法中，基於《日美安保條約》，必須以和平方式循外交途徑解決，不得使用武器。兩年前，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之間在一個小島上發生糾紛，後來提至海牙國際法庭解決，結果判決該島屬於新加坡。那麼俄羅斯和日本在北方四島的糾紛，是否也能到海牙國際法庭，從法律的觀點來解決？謝謝。

山西弘朗（政治大學民族所碩士生）：

剛才子安老師提出「戰鬥的國家是祭祀的國家，不戰鬥的國家是不祭祀的國家」，可是在研讀國際政治學時，首先會討論到何謂「國家」，在國際政治學裡，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最終仍舊需要使用武力，這是第一個定義。第二則是國家一定有領土，所以應該保護領土。國家為了保護領土一定有個中心、核心性權力建構，若說「不戰鬥的國家是不祭祀的國家」，從國際政治學來看，那就已經不是國家了，所以我覺得這部分似乎是很棘手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覺得沖繩跟台灣都有被殖民的歷史，所以狀況很類似，但戰後台灣需要國家的體系，台灣內部也建立忠烈祠等類似靖國神社的體制，當我們在思考國家的成立時，就需要一個中心，類似靖國神社或忠烈祠之類的東西，這是我覺得需要思考的問題點。

子安宣邦：

首先我回應一下北方四島是否可以構成另一個新的觀點。

我認為沖繩比較特別的地方在於，它反映戰後日本所有的問題，例如日本國內的自我矛盾、分裂的問題、戰後死者的雙重性等問題，所有問題可以說都濃縮在沖繩問題裡，從沖繩歷史的層面來看，還是只有沖繩能夠成為新的觀點。

剛才這位同學提到國家概念的問題，我認為那是二十世紀成立的國家概念，牽涉了國家應該如何行使主權的問題，所以戰爭的定義也是在這樣的國家概念下成立的。這個二十世紀成立的國家概念，最後的呈現就是二次世界大戰，現在整個世界的趨勢應該已經有變化了。

日本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不能戰鬥，所以我說「戰鬥的國家」就是從那兒得來的。我相信日本的憲法也許已經超越二十世紀國家概念成立時的國家論述，而提出了一個超越現代國家概念的方向。從這個方向思考的話，我會肯定日本的憲法。

顧玉玲（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生）：

我覺得在這篇文章裡比較看得到的是，在日本歷史裡空白的、被消音的沖繩人民的聲音，而從這個角度或觀點來看日本歷史。我在閱讀的時候非常感動。

可是我想問的反而是另一個角度，這篇文章是透過沖繩審視、看日本，子安先生提到，最後應該是人民的力量。我想請教的是，沖繩的人民怎麼看自己？此外，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子安先生如何透過沖繩來看日本，但如果說是「人民的力量」才是對抗日本官方歷史的主要依據，應該反過來問，到底日本的知識界是怎麼跟沖繩的知識界——我不知道這是不是區分開來的——進行「人民力量」的可能串連？作為日本知識分子，您是否也關注沖繩人民如何看待他們自身在歷史的位置？他們在日本歷史裡承擔了這麼多戰爭的代價，卻又是被消音、不被記錄的那塊歷史經

驗？

陳秋山（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我的問題主要扣連到昨天子安老師在最後提到的多元化運動。首先我要說的是，在子安老師書寫的這篇文章裡有個鮮明的對照：一是國家祭祀，其所召喚的是帝國「英靈」，一是沖繩人在地的祭祀。根據子安老師的觀察，那是一種超越國界的「民眾之力」。前者是一種所謂帝國的同一性、實體的一元化運動，後者或許可以被視為從帝國同一性運動中脫離出來的別種實踐，這也許會扣連到玉玲的關切。把這兩個情景作為對照放在一起書寫，似乎形成子安教授這篇文章的批判實踐。從這裡銜接我在這篇文章中讀到的兩樣實踐的交會，這兩樣實踐有別於帝國召喚英靈的同一化運動，而可能與我想問的多元化運動有關。第一樣實踐是子安老師在這篇文章中的批判實踐，即從日本的外部，這個外部和內部的弔詭或某種關係，從沖繩的歷史對日本進行歷史性的批判；第二樣實踐是，子安老師所掌握到的沖繩人民對戰爭受難者無分別的祭祀實踐。我在想，這篇文章裡面交會的這兩樣實踐，跟子安老師所謂的多元化運動之間是否有所關連？

薛熙平（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我的問題大概分成兩個。

一方面日本的憲法是反戰、非戰的憲法，是由美國所給予的，另一方面，日本目前還是有很多美軍基地。美軍基地和非戰憲法不是一個共同的結構，這個結構是否被集中到沖繩？也就是說，所有的基地都搬到日本本島之外，在這個情勢下，一方面彷彿日本本島是非戰區，其實沖繩仍舊是非戰的反面。此外，我不太確定日本的自衛隊的管轄和美軍基地之間的關係，如果再考慮到日本自衛隊的問題，這個問題可能就變得更複雜。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子安教授今天的講題，某種程度也可以看作是「以沖繩作為方法」的例子。如果我把「方法」理解為「觀點」，也就是說以沖繩作為觀點回頭來看戰後的日本，我的質疑

是，怎麼才可以真正採取沖繩的觀點？沒有生活在那樣的武力威脅下所採取的沖繩觀點，是否還是與生活在沖繩的人的觀點不見得相同？也就是說，我們之所以能夠採取非我們所在、我們不處在其中的位置的觀點，其可能性和限制是什麼？我們能夠很自由地去採取另一個我們不存在的地方的觀點嗎？

子安宣邦：

我先回應第一個問題。首先有個很重要的問題是：歧視的人到底能不能聽到被歧視的人的聲音？我認為歧視者應該聽不到被歧視的人，但歧視者可以意識到他們的存在，從意識上、心理上的轉變，可以得到另一個新的視野，能發揮我們的想像力，和他們共同擁有他們的問題。我們只能這麼作。

另一個問題是，我們生活在本土的人如何看待沖繩的問題，如何和他們共有、思考沖繩問題。

我想先以1960年代越戰發生時在日本引起的市民運動來說明。越戰發生時，日本有些人展開反美運動。有個市民運動的組織者叫小田實，是我的好朋友，他的作法是把反美運動放在一般人的生活中。1960年代日本處於經濟快速成長的階段，這個快速成長已經成為美國對越戰的供給資源。小田實的論述告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就有許多是協助美國戰爭的成分。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例子。目前日本境內的美軍基地很多都在沖繩，但很多本土的人都刻意遺忘，所以我們日本人重新思考沖繩問題時，不是去解決它，而是把它當作自己的問題來看。

第二個問題，關於多元化運動、國家祭祀和沖繩祭祀的問題，我認為國家祭祀是透過給死者國旗，而把死者的靈魂囚禁在他們的神宮裡面。沖繩的祭祀根本不用國旗，純粹是祭祀，也許可以說國家祭祀是一元化、沖繩則是多元化。但我想要強調的是，沖繩的部分已經超越國界、人種，亦指沖繩拒絕國家的祭祀，只用自己的方式來祭祀死者。

所以我主張要「站在未被計算的死者那方」的意思是說，我要拒

絕國家的方式，要在無數死者那方來思考戰後日本問題。站在未被計算的死者那方的人們，我想稱之為「亞洲市民」，這些市民是不是可以一起共有亞洲的歷史？這些市民才有改變國家的可能性，這是我想要主張的概念。

吳哲良（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生）：

子安教授您好，我想接著您的回應繼續發問。

您剛才提到未被計算的跨國的死者，即您稱之為「亞洲市民」，是希望能夠把亞洲的戰爭歷史都納進來考慮。這其實也回應到您文章裡提到，日本以國家主權、透過國家篩選出死者，並且把沖繩併入美日安保體制中帝國常態戰爭的戰略位置；可是沖繩人卻以更超然的、跨國的方式來祭祀整個亞洲的死者。我的問題是，這種超越國家的、而且能在民眾之間形成超然的、反思的力量，除了沖繩島民的祭祀方式之外，有沒有可能還有其他方式？譬如說，一方面從整體區域的歷史結構內，耙梳整個亞洲的戰前或戰後歷史發生了什麼事情的這種亞洲整體意識的層面來考量；另一方面也要去思考的是，在當前的國際關係或區域政治裡，是什麼樣的國際局勢或政治結構的因素，讓這種超越國界的民眾主動、自發的力量無法形成？令這種超越國界的市民運動無法發生的當代國際政治或區域政治因素是什麼？這是否也是我們思考的起點？

子安宣邦：

也許我說的「超越國家」這個詞引起了一些誤解，我並不是說要另外創造新的共同體，而是希望從民眾的力量來改變國家，希望民眾之間應該要出現這樣的力量。我想強調的是，我並不是批評國家分裂，我非常重視國家分裂，如果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想法，他們的力量、思想都會被國家吸收，所以國家有「分裂」是很好的。目前我想思考的問題是，我不是想加強國家的框架，而是我們如何創造出改變國家的力量，這是我的問題意識。

目前我要自行實踐的是，想要展開一個運動，剛才我說的「亞洲市民」，如果想當亞洲市民只需要認同一條原則：絕對不使用武

器。如果認同這條就可以稱得上是亞洲市民，這是我目前想展開的運動。

劉紀蕙：

我想要問子安教授的是，您早年的專業是倫理學，長年研究與教授倫理學，可是實際上日本十九世紀以來的倫理學論述都被您解構了。您檢討他們如何被架構在國家的概念，包括把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以國家為最高的人倫態來觀看。您對日本國語、民俗、儒學，或者是現代性與戰爭的問題，基本上都是在檢討國家主義的問題。我的好奇是，您現在怎麼重新思考倫理的問題？您如何再定位自己的倫理專業？我們如何再思考倫理的問題？換句話說，有關您所謂的「市民」的概念，您怎麼樣再解釋？或是，有關持續的運動的問題，這是不是在一個倫理的、人和人的關係，還是說這是另外一個概念？

子安宣邦：

劉老師提的問題，不是5分鐘、10分鐘就可以回答的問題，一定要花上1小時。所以大概花個10分鐘稍微談一下。這個問題恐怕是昨天的問題的延續。

劉紀蕙：

我覺得很關鍵的還是在於有關視角被限制以及如何可以脫離自我視角的問題，如果視角是被國家所局限而建立的倫理觀，要破除的話，是否有可能重新思考倫理的問題，也就是我們如何對待人的問題，我很想聽聽看子安教授的想法。

子安宣邦：

先說明一下「倫理」這個詞彙，在儒學裡所謂的「倫理」算是死去的詞彙，只有《禮記》的〈樂記篇〉裡出現一次而已。後來大家認為「倫理」是很有歷史的詞彙，其實不是這樣，實際上它是近代之後才出現的字眼。

我們現在使用的「倫理」就是英文「ethics」的翻譯，所謂的

「ethics」所指涉的是，人活在市民社會裡應該如何生活、如何應對別人的倫理。很弔詭的是，近代日本在明治時代翻譯這個詞彙的時候，日本沒有什麼市民、也沒有市民社會，所以進口「倫理」這個詞彙時，也同時進口倫理的問題，也就是市民社會的問題，整個問題意識都搬到日本。

在日本來說，很奇怪的是，先有倫理學再來思考倫理問題，算是種日本近代化的模式。我覺得這是個很重要的部分，因為所有近代化的過程，都以顛倒、相反的方式來思考問題，所以是和西方順序相反的方式引進。

對日本來說，從西方進口的倫理學太過抽象，在形成國家時根本沒用，所以他們需要另一個倫理學，也就是國家倫理學或國民道德論，這又是一個弔詭的現象，在國家倫理學中又需要重新理解儒學，是故儒學復甦。

日本的倫理學可以說是分裂或具有雙重性，在學術界不斷地討論西方的市民倫理學，除此之外，還有國家倫理學，但這兩個倫理學在1945年就結束了。爾後，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時，生命倫理學、環境倫理學等新的倫理學興起了，這些新的倫理學亦會影響日本學術界，因此日本的學術界也漸漸地改變中。

劉紀蕙：

台灣從1895年開始的日本教育體制，以及中國晚清知識分子大量翻譯、移轉倫理學科、修身學科，整套國家倫理、國民道德都在中文脈絡中不斷地發生。倫理並不只是日本的問題，而也是中文脈絡的問題。